

马克思东方社会思想的理论与实践

——兼与张奎良同志商榷

刘 在 平

本文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社会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的系统研究,力图澄清一些理论上的偏颇,从而对马克思东方社会思想能够有比较完整准确的理解。同时,文章理论联系实际地分析了马克思东方社会思想在东方革命和中国革命中的指导作用,并据此对于我国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一些理论问题作出尝试性的探讨。

马克思东方社会思想对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刻启发主要有:着眼于生产方式的改革,将其作为社会发展与变革的实质内容;从促进生产方式变革出发促进商品经济建设、调整所有制结构、坚持各个领域改革的配套与系统工程;改革与开放应相辅相成,以自身的变革作为对外开放的支撑。

本文还就亚细亚生产方式在抽象意义上和在具体、历史意义上的区别等问题作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探讨。

作者:刘在平,男,1951年生,历史学学士、法学硕士,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政治学教研室讲师。

最近读了张奎良同志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的《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另一篇是发表于《北方论丛》的《马克思东方社会主义的构想及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启示》。两篇文章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只不过侧重面有所不同。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东方社会的学说进行专题探讨,无疑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工作。但是,对于张文中的许多观点,我们是不能同意的。

早在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就开始以中国、俄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状况为内容为《纽约每日评论》撰稿,亚细亚生产方式则一直受到马克思的关注,以后在大量的著述和通讯中更把东方国家的革命与社会变化纳入视野。今天,重新审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学说的态度和理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本着理论探讨和学术争鸣的愿望,现提出自己的一些浅见,就教于张奎良同志及学界同仁。

一、“世界历史”思想与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评价

张文把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最初形态,即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二是东方社会理论的形成,即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三是马克思关于俄国革命发展道路的论述,即跳跃“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张文认为,在其“最初形态”,马克思从“世界历史”的思想框架出发,对于英国在印度斯坦的

统治，对于英国侵华战争的论述“还未能彻底扫除长期流行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并且“很容易以西方文明的尺度去看世界，以资本主义为基准为东方社会设计未来的发展前景。”因而，是陷入与自身体系的矛盾。

张文之所以这样断言，是认为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的评价面临着三个矛盾：一是“世界历史”思想与人的价值观念的矛盾，“为了历史而牺牲人的价值，甚至对殖民者的侵略暴行也从理智上加以宽宥和容忍，这与马克思一贯坚持的崇高的人道主义理想和原则是相悖的。”二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要把东方各国一概拉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之内，……忽视了矛盾的特殊性。”三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主张在东方各国发展资本主义关系，……这就使他的‘世界历史’思想与消灭资本主义的宏伟理想和现实工人运动的实践处于深刻的对立和矛盾中。”张文的这种分析，把“世界历史”思想（实际上是关于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思想）与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分析、评价对立起来，割裂开来，令人感到遗憾。

张文认为“世界历史”思想的核心问题是各民族怎样冲破狭隘地域界限走向世界历史，此言充其量只说对了一半。走不走向世界历史，不完全在于，或者说不主要在于各民族自身的选择，而在于资本主义对世界市场的冲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①——《共产党宣言》中的这一论断，是同《资本论》相一致的：“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②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种经济形态纵向演进和生产方式横向拓展交织在一起的“世界历史”的脚步可以被地理位置所阻止，否则就根本无法解释西方列强向东方国家的扩张与侵略。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精彩之处恰恰在于，指出了19世纪西方向东方的侵略扩张，实质是资产阶级在更广阔范围拓展其市场网络，是处于发达的、高级形态的资本主义因素向处于落后的、低质的社会形态的必然输入。这决不是东方世界愿不愿意、如何选择的问题。除非我们或是对侵略扩张闭目塞听、视而不见，或是把侵略仅仅看成同质社会之间的民族之争、宗教之争、领土之争，才会得出马克思是受到“欧洲中心论”的影响的结论。正是由于深刻洞见了殖民侵略与统治的背后，是不同质的社会经济结构、文化结构之间的冲撞，马克思才断言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必然破坏其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制度；对华战争冲击了天朝帝国分散于下的小农经济和极权于上的封建专制结构，打破了其封闭状态。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逻辑前提，就是要不要承认东方社会是落后的、低质的。以马克思对中国的分析为例：“我们曾认为，除了鸦片贸易之外，对华进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障碍，乃是那个依靠着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③“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④这种分析表明，恰恰是马克思在历史上第一次切中要害地道出了中华民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54—255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67页。

③ 马克思：《对华贸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57页。

④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二页。

族为什么与现代文明拉开距离的症结，道出了为什么庞大悠久的中国在列强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的真谛。这决不是“把东方国家拉入资本主义”，而是把对东方国家的考察纳入“世界历史”辩证思维的思想体系。

“世界历史”思想辩证思维的精髓之一，在于揭示人的解放、民族解放、阶级解放与社会经济形态演进之间的对立统一。马克思指出：“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①“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②这里显然并不是“陷入”矛盾，而恰恰是对于生产方式变革和人道主义之间矛盾的辩证解决。其实这一矛盾并非在考察东方社会时才遇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原始积累时指出：“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生产方式的消灭，“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集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最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③而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完成了“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④

社会因素以直接对立的表象出现，往往蕴含着以曲折迂回的演进、以代价和发展错综交织为特征的辩证统一。如果说血亲复仇、列强征伐、宗教战争的刀光剑影的确可以焚毁人道主义的圣殿，那么，只要生产力为自己开辟道路，只要生产方式变革的巨轮向前驱驶，人道主义则象地火潜行一样可以找到自己复苏的途径。马克思指出：生产方式“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⑤这段话深刻地说明，生产方式决定人的本质，生产方式的变革，为人的解放创造条件。在单纯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中，人的解放毕竟是极为有限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不仅由于解放生产力，而使人们在更大程度上解放于自然力的支配，从而进一步提高需要的层次；同时由于人与人关系的改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扩展了满足需要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个人从已往社会关系中的解放。贩卖黑奴的血与火的罪恶片段、“圈地运动”中“羊吃人”的悲惨序曲，由于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而拉开新的生产方式的帷幕。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社会化生产规模的空前扩大，科学技术的空前运用与发展，人类（包括重新沦为剥削和压迫对象的工人阶级）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度。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变革，更使人类精神解放的需求与实现之间搭起了桥梁。新的锁链要靠历史对于私有制的第二个否定来粉碎，但第二个否定必须以第一个否定为前提，——“只有通过最大地损害个人的发展，才能在作为人类社会主义结构的序幕的历史时期，取得一般人的发展。”^⑥

如果是把人的自身发展、人道主义价值原则的实现排除在生产力发展、生产方式变革的历史进程之外，那才真正是陷入了“单线论”的泥淖。而如果马克思没有把“世界历史”思想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0页。

② 同②，第42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830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832页。

⑤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页。

⑥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第190页。

中辩证唯物史观的精华运用到对东方社会的考察，那才真正是陷入了与自己一贯思想体系的自相矛盾。幸运的是，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宣布：“‘对立统一’是否就是这样一个万应的原则，这一点可以从中国革命（指太平天国革命——本文作者注）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中得到明显的例证。”^①辩证思维之光开始穿透神秘的东方大地迷雾笼罩的上空。

历史的矛盾在东方社会受到冲击的时候，似乎更加尖锐化与表象化——“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的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②然而，也正是在东方，历史矛盾的内在统一——传统社会结构迸裂与人道主义升腾及在曲折、深层进程中的并行不悖，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受到挑战的是分散经营中劳动对象对人的全面束缚，是人身依附关系的禁锢，是种性制度和森严的等级制度对人性的扼杀，是宗法关系与专制制度对人的精神自由的窒息，是经济文化的闭关性对思维与价值观念的封锁……。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指出：“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③

我们没有理由责难马克思对侵略者过于“达观”或偏袒，更不应认为“马克思在构思东方社会的发展前途时，只考虑到东方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都很落后，必须输入西方的刺激，即使这种刺激方式是非人道的也在所不惜。”^④

其实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深刻揭露了俄国的趁火打劫，而且对西方侵略者的卑鄙丑恶给予大量的鞭挞。然而，辩证法是无情的。无道的文明刺激了处于“道义”一方的封建帝国，构成了奇异的客观历史面目，对此如若不解，大概是犯了“以一刀切的思维方式来裁剪丰富多彩的历史”^⑤之嫌吧？

解释历史现象的实质，并不等于为东方社会发展设计具体的道路或规划具体的前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并没有抱什么太大的希望。侵略的刺激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只不过是提供一种前提。“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为这两个任务创造物质前提则是英国资产阶级一定要做的事情。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⑥对落后社会结构的冲击不能取代人民革命，资产阶级所提供的前提只有为新的社会革命所支配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象可怕的异教神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⑦

列强用入侵震撼、冲击了源远流长、闭关沉睡的东方世界是一回事，东方民族要不要按照资本原始积累悲惨而沉重的过程重蹈西方覆辙是另一回事——实际上东方国家在殖民主义格局形成之后已永远失去了按照西方模式发展的可能性。选择与设计自己的发展道路是东方社会先进力量不可取代、更不可剥夺的权利。

①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页。

②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6页。

③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8页。

④ 见张文：《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第31页。

⑤ 见张文：《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第31页。

⑥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73页。

⑦ 同②，第75页。

二、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东方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

张文认为，马克思最初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命题，只是为了论证原始公有制，并未主要着眼于东方社会的特殊性，而一旦接受了新的科学成果，全面分析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承认了以往几千年东方社会特殊的发展道路时，就陷入了逻辑上的矛盾：“既然东方社会作为一种特殊的形态可以和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长期并行地发展，可以不遵循西方社会的历史规律，那么为什么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东方社会就要失掉这种特殊性，非得经过资本主义形态呢？”张文认为，马克思在晚年否定了资本主义的普遍性，甚至断定农村公社在各方面都比资本主义好得多，越来越坚定地认为俄国“可以在村社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共产主义。”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不是提供了东方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因而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是否可以跳跃？这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是理解马克思东方社会思想的关键。而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又是正确理解第二个问题的前提。

将亚细亚生产方式归结为原始公有制，从而作为初始形态纳入人类经济形态演进序列中，是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抽象，而非历史描述意义上的具体、客观的判断。马克思在论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指出：“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的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①亚细亚生产方式中村社所有制，由于地缘因素以及后来的文化、政治因素等都得到最丰富的具体发展，因而很自然地应当产生关于原始公有制的最一般的抽象。马克思还以畜牧民族为例进一步说明：“在他们中间出现一定形式的，即偶然的耕作。土地所有制由此决定了。它是公有的，这种形式依这些民族保持传统的多少而或多或少地遗留下来，斯拉夫人中的公社所有制就是个例子。……象在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耕作居于支配地位，那里连工业、工业的组织以及工业相应的所有制形式都多少带着土地所有制的性质”。^②我们完全可以说有两种意义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第一是抽象意义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它排除了生动、具体、丰富的存在与发展状态，因而在具有一定阶段横跨欧洲大陆、而在东方国家亘古无更的普遍意义。第二是具体历史意义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它已经超然于原始公有制本身的具体规定，而涵盖了分散经营、自给自足、阶级对立，以至于成为国家统治的基础等各种内容。这里附带提一下，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划分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已多次具体论述过东方社会。而恩格斯根据摩尔根《古代社会》写成的《起源论》，只不过是马克思关于人类原生形态论述的重新证明。马克思从不同角度分别在两种意义上阐述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十分自然的，如同对待资本、货币、国家等命题一样。这里既不存在最初受到资料限制而未发现东方特殊性的问题，也不存在以后接触到东方具体资料时产生的“省悟”与“回归”。

当涉及到东方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时，抽象则必须上升到具体。具体历史关系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许多抽象规定的综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根据分工发展阶段不同划分了三种所有制形式：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我们看到后两种所有制形式中的许多具体规定：阶级对立、城乡对立、束缚于地亩上的农奴劳动、行帮组织、粗陋的土地耕作、手工业式工业等等，已在东方社会得以充分的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07页。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0页。

繁衍。全部问题在于，从抽象的定义出发，以原始公有制的单纯与资本主义庞杂的体系相比较，奢谈初始原生公有制向高级形态公有制的直接迁转，只能陷入思维的误区。必须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实际演变、实际发展，以及与之在现实中浑然一体的文化、政治制度出发来评价和估量亚细亚生产方式将为东方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什么样的基础和背景。张文把亚细亚生产方式分明是落后、低质的特殊性抬高为比资本主义优越，竟然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这里对马克思的曲解是十分严重的。

如前所述，马、恩早就揭示了东方社会的特殊性。而张文所提到的德国史学家哈克斯特豪森对俄国公社组织的吹嘘、俄国民粹派代表特卡乔夫对俄国农民比西欧没有财产的工人“更接近于社会主义”的标榜则受到恩格斯深刻的批判。^①至于马克思早在1859年对于“俄国的1793年”（可见是指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一种可能性的预见，恩格斯直到1885年还在重申。^②这些说明，马、恩的思想是一贯的，他们心目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从来未曾被提高到社会主义革命条件的位置上来。以下几点有必要提出来加以特别的关注：

第一点，东方社会，尤其是印度、中国、俄国，的确存在着革命的危机，但其最大可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点，实际上被俄国1905年革命、中国辛亥革命所证实，并被以后布尔什维克和中国共产党经历的某些革命阶段所证实）。马克思于19世纪50年代谈到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欧洲大陆，显然指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恩格斯于1885年针对俄国状况指出：“在这个国家里，形势这样紧张，革命的因素积累到这样的程度，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状况日益变得无法忍受，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从原始公社到现代大工业和金融寡头——都有其代表人物，所有这一切矛盾都被无与伦比的专制制度用强力压制着，这种专制制度日益使那些体现了民族智慧和民族尊严的青年们忍无可忍了，——在这样的国家里，如果1789年一开始，1793年很快就会跟着到来。”^③

第二点，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自身的发展无论怎样设想，都包含着对它否定的基本思想。马克思分析道：“农业公社的构成形式只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先验地]说，二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④农业公社二重性的本身的效应也是二重性的：一方面可以成为其强大生命力的源泉，另一方面则可能成为其逐渐解体的根源。之所以具有生命力，是因为生产方式的具体存在所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成为其稳固的基础；而解体则在于其本身内在矛盾发展必然不断地形成自身的否定因素。由此我们看到马克思的思路是明晰的：如果集体所有制因素战胜了私有制因素（这当然是有条件的，本文下面马上就要谈到），那就意味着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公有制因素与历史现实条件中的革命因素相结合，战胜了生产方式具体存在和发展中必然结成的一系列社会关系，粉碎了农业公社本身的自然发展；如果是私有制因素战胜了公有制因素，则将是自身的解体否定了自古以来苟延残喘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中的原始公社制，抽掉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抽象规定中的基本依据，从而融汇于新的社会关系中。总之，

①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617—618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16—629页。

② 恩格斯：《致维·伊·查苏利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50页。

③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52页。

④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435页。

两重性中任何一方对另一方的否定，都将最终转化为否定生产方式的彻底变革。也就是说，无论革命的具体形式和道路如何（这将取决于历史环境与条件），亚细亚生产方式都只能是变革的对象，而决不是为革命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正因为如此，恩格斯针对抬高和吹嘘农村公社、认为“他的农民们是共同占有土地的，于是他便利用这一点来把俄国农民描绘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体现者、天生的共产主义者”的赫尔岑等人，进行了淋漓的批驳，并且深刻指出：“谁竟然肯定说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指社会主义革命——本文作者注），他就只不过是证明，他需要再学一学社会主义初步知识。”^①

第三点，马克思在其晚年，在与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提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②如果依此断定马克思的想法与以前一贯思想相比是发生了巨大的反思和突破，甚至是放弃了关于资本主义普遍意义的理论，那就不仅是牵强的，而且是曲解的。有两个问题必须澄清。第一，这里指的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起点的，是土地公有制，而决不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以至于东方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如前所述，原始公有制一直在东方社会的历史中顽强地延伸，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抽象命题正是以此为依据的。但是历史现实中具体存在和发展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且从理论上讲，所有制形式与生产方式是不可互相取代的两个命题，这一点本文后面将专门提到）。马克思讲的“公社是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和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③也完全是限于原始公社制——土地公有制。第二，马克思的话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这恰恰是因为，必须有革命来变革集中了东方社会停滞、落后特征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相配套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和专制制度。这正是“条件”的实质。其实就在恩格斯批驳特卡乔夫、赫尔岑等人空谈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论调的同时也谈到了俄国公社所有制作为直接过渡的起点的可能性，但必须有前提条件：“这种过渡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末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④一边批判关于直接过渡的荒谬，一边又谈到可能和条件，可见马、恩的思想是一贯的：原始公有制若要获得枯木逢春的机缘，必须与更高社会形态中的公有制直接结合，但是，“凤凰涅槃”的再生必须有脱胎换骨的条件，这就是必须完成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变革与否定。对此，恩格斯给丹尼尔逊的回信中讲得更清楚：“在俄国，从原始的农业共产主义中发展出更高的社会形态，也象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是不可能的，除非这种更高的形态已经存在于其他某个国家并且起着样板的作用。”^⑤“实现这一点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外部的推动，即西欧经济体制的变革，资本主义体制在它最先产生的那些国家中的消灭。”^⑥

①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17页。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31页。

③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431—432页。

④ 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1893年10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五卷，第148页。

⑤ 恩格斯：《班尼·弗·丹尼尔逊（1893年2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第39页。

⑥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一卷，第37页。

无论是树立模仿的样板还是外部推动，在马、恩提出的条件中都包涵了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否定的实质。这一点马、恩在晚年都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改变了就是修改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方式决定作用的基本原理。而这些思想甚至在后来韦伯、帕森斯、胡格韦尔特等西方社会学家关于发展中国家“迟发”、“外发”实现现代化的较为精彩的学说中屡见援引，可见其影响深远。当然，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并没有成功，而且资本主义有了新的更为全面的发展，这不仅使东方失去了马、恩当年设想的直接过渡的条件，而且实际上使东方资本主义发展亦成为不可能。

三、跳跃“卡夫丁峡谷”与东方社会发展的道路选择

应当说，由于东方革命在俄国首先爆发，由于俄国革命成功的实践，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东方社会的理解是有说服力的。他援引马克思的话：“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但这是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即以自由劳动者的协作以及他们对土地和他们所产生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为基础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人私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列宁进一步解释道，这里指的个人所有制，是以生产资料为基础的，也就是“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①马克思的这番重要论述至少从三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钥匙：第一，社会主义的建立，是否定的否定。其中必须经过第一个否定，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对分散个人所有制的否定；第二，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是什么？可能有許多，但能够完全对分散经营的落后生产方式否定的，主要是“即以自由劳动者的协作以及他们对土地和他们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为基础”，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第三，第一个否定的完成，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马克思曾设想的避开资本主义制度的痛苦和弊端，应当是指这样的过程，但决不是社会化生产方式本身。马克思在论述俄国社会时曾经说过：“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它不象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同时，它也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他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土地个体耕作变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土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有助于他们从小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②内在条件：土地公有和部分的（草地上的）集体耕作；外在条件：与之同时存在的控制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因此俄国可能超越资本主义在西方完成第一个否定时所经历的艰难得多的峡谷。但第一个否定的实质内容——从小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即生产方式的变革，是必须包涵于其中的。

不知张奎良同志是否注意到，就在马克思谈到设想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之后，在同一信件草稿中紧接着就谈到了俄国的“农业公社”的一个特征，并指出这个特征是它的软弱性的根源，“这就是它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而保持这种

^①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26页。

^②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第435—436页。

与世隔绝的小天地。”^①这实际上正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分散、隔绝的小农生产方式的体现。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了对其改造的必要性：“要使集体劳动在农业本身中能够代替小土地劳动这个私人占有的根源，必须具有两样东西：在经济上有这种改造的需要，在物质上有实现这种改造的条件。”^②

在理解马克思这一思想中，关于卡夫丁峡谷的含义是问题的关键。这里，至少有三个重要区别是不容混淆的：

第一，资本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区分。前者既包括经济制度，也包括政治、文化制度，包括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中内在基本矛盾，同时包括资本主义制度确立过程及发展变化。后者则就其经济基础中生产资料占有方式与集体程度、生产规模与组织体系而言。

第二，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与生产方式的区分。前者指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后者则包括生产资料的集中化程度、生产过程中的合作与联合的状况、生产的规模及社会化程度，以至于生产的组织与管理方式等等。由于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因而所有制中生产方式具有重要地位，但两者决不能等量齐观、或互相取代。例如原始公有制，却可能与分散经营、个体经营相结合而构成封建的生产方式。而所有制的变更，也并不意味着生产方式的变革已经随之同时完成。

第三，商品经济的经济形态与商品经济的社会效应的区分。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商品经济的规定性在于生产的目的是用于交换，不同的商品生产者之间按照等量价值相交换的原则交换产品，从而使市场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得以充分的发挥。这种经济形态不仅是社会分工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且是社会化生产的催化剂。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商品经济的社会效应却具有双重性。其一，它化解了自给自足的分散经营，打破了血缘、家族关系、人身依附关系、宗法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拓开了道路。由于商品经济是对自然经济的否定，成熟的商品经济是对简单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产品经济本身不能完成对自然经济的深刻变革，所以商品经济的这一重作用是必然的。其二，它在发展过程中助长了私有制造成的不平等，等价交换原则在价格和价值的脱离中扭曲变形，一般等价物——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攫取“太上皇”地位，真实价值被虚伪性掩盖，人格再次被泯灭。因而与商品经济几乎形影相随的价值崩溃、道德沦丧、尔虞我诈、风气败坏等等成为其极不光彩的一面。然而，由于重商主义、殖民主义的历史阶段性，由于商品经济并非以私有制为唯一的必要条件，因而商品经济的这一重效应（或称之为副效应）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避免或超越的。我们说弄清商品经济与其社会效应之间的区别，也就包括弄清两种效应之间的区别。

弄清以上三个重要区别，我们则不难理解下面一个重要区别，即社会制度、革命道路的选择与社会形态演进中生产方式、经济形态转化嬗变的区别。卡夫丁峡谷的涵义，应当是也只能是指资本主义制度的选择和建立，指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具体发展过程及人类付出的痛苦惨重的代价，指商品经济在重商主义、殖民主义阶段严重的副效应。跳跃卡夫丁峡谷，是指通过主观、自觉的对于社会制度和革命道路的具体选择，避免重蹈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覆辙，吸取西方资本主义的肯定成就——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和社会化生产方式的普遍确立，从而完成东方社会发展的历史课题。其中决不包含着对于传统社会基础的任何肯定，反而必然包含着东方社会自身传统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的彻底变革。东方革命决不因新的社会制度

^① 同①，第436页。

^② 同①，第438页。

的先进性和选择、确立这一制度的直接性而成为发展的简化或轻松，反而由于东方社会基础的落后，由于政权建立后必须进行补课，因而只能是更加艰苦、更加复杂、更加繁重。当第一次否定的否定对象还顽固存在时，其直接、有效的否定力量仍然只能来自第一次否定本身。第二次否定只能吸取、借助第一次否定的力量，在完成第一次否定的基点上深化延伸，从而使第二次否定取得实质、最终意义上的完成。这无疑决定了第二次否定的曲折性、复杂性、长期性。

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前面指出了马克思设想的俄国农村公社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必须经过改造、经过对其依存的传统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变革。但在以后的历史现实中，这种可能性泯灭了，因为马克思所讲的必要条件——西方工人阶级的革命胜利并未实现。至此，东方社会变革已不是利用条件的左右逢源，而是被逼无奈的绝处求生。殖民主义列强的高速发展、资源机会等等，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停滞（或低速发展）、丧失机会、付出资源等基础之上。于是两个方面的压力同时作用于东方国家：一方面是丧失机缘、市场、付出资源、代价，在世界格局中处于受控制、受剥夺的被动境地；一方面是传统的低质社会经济、文化结构严重滞化、掣肘自身的发展。对两个方面困境的全面、辩证的认识，成为东方国家一切变革与发展道路、战略构思的重要的思想前提，任何偏废都会铸成方向性错误。

正是由于完成了第一次否定，但尚未完成第二次否定的西方发达国家不仅不可能提供援助等条件，反而是以掠夺、控制者而作用于东方不发达国家的，其发展道路也就丧失了任何样板作用——东方国家面临的世界格局、其发展的时间和机遇、其人民心理承受力和资源承受力都不允许重蹈西方国家的覆辙，卡夫丁峡谷已不是回避或环绕的问题，而是完全堵死的问题。故而作为迟发展的东方国家必须以自觉的、主观人为的姿态，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另辟新途。社会主义制度在尚未具备马克思所提出的基础的情况下建立起来，正是这种选择的必然反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历史任务由于种种原因而成为重大的历史遗留。同时，正是由于主观人为的选择不能完全取代社会发展规律本来内在的要求，包括所有制变更在内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不能完全取代社会形态演进的变革内容，因而必须吸取借鉴资本主义的肯定成就——其中尤以社会化生产方式和管理体制、商品经济的催化效应为不可或缺，从而真正实现传统东方社会结构的深沉内在的变革。两个方面的压力所造成的悖论和困境是十分艰涩、十分严峻的。正因为两个方面的问题互为矛盾，所以容易互为掩盖。或许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纷纷建立的历史性胜利，使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极易为人们所忽视、所迷误。而正是在第二个方面的问题上酿造着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的徘徊与挫折，呼唤着艰苦的探索与改革。也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容易梗塞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学说的思维向度与穿透力。

四、马克思东方社会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

尽管俄国是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东方社会之一部分，但当我们把视线移向中国大地时，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原始公社的土地公有、尤其是集体耕作，在中国近代社会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早在商鞅变法，实行废井田，就直接破坏了原始公社，铁器的发展使自“初税亩”始的土地私有普遍蔓延。封建社会长期实行的“均田制”、“劝农桑”、“重农抑商”等政策不断固化着作为专制统治基础的小农经济。至于几度出现的“屯田”、“赐田”、“职田”等不过是与“封地”相伴随的统治阶级的土地分赃，连同土地掠夺和兼并造成大土地私有

的恶性膨胀，一方面，农民与生产资料的脱离造成奴隶与游民，实质上是一种朝向奴隶占有制度的历史的倒退；另一方面，由于农民起义的不断激烈反抗和统治阶级对农民的怀柔与对大地主豪强和封建割据者的“削藩”、抑制，使得“自给自足”、“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在不断循环中亘古难更。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指出，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①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最初考察中国时，准确地透视了在古老帝国遭受世界贸易潮流冲击和西方列强欺凌的背后，是两个不同质的社会、文化结构撞击的实质。在这里，毛泽东的分析与马克思的洞察是一致的。

张文认为“东方国家，特别是俄国本来就存在着土地公有制，因此可以不必去费二遍事，先去发展资本主义，破坏原有的公有制，然后再经过革命废除私有制去建立公有制。”这对于中国革命来说，不是有点象天方夜谭一般的奢谈吗？（也让人想起我国民主革命初期曾经遗害不浅的“毕其功于一役”的主张。）张文又说：“中国革命就是在毛泽东同志的卓越思想的指导下，成功地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用实际行动实践了马克思的东方社会主义的构想。”照此说来，中国是没有、也不必“破坏原有的公有制”了，也不必“再经过革命废除私有制”了。这实在是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的改革事业艰巨性、深刻性的严重曲解。如果说马克思曾经作出过关于俄国农业公社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有条件的假设，那么在中国，革命面临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仅不具备马、恩设想的外在条件，就连公有制基础又上哪里寻找呢？更有甚者，传统社会结构的黑暗与腐朽被帝国主义所利用，侵略势力与国内反动势力相勾结，太平天国、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一次次点燃的希望之光被扼杀。西方列强已经从“不自觉的”刺激中国革命的工具转变为“自觉的”扼杀中国发展变革的刽子手，中国人民面临的是三座大山，又谈何“直接过渡”的优越条件呢？

把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看成是马克思当初对俄国由农业公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构想（应该读作假设）的实现，是理解马克思东方社会思想的重大误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建立，恰恰是对马克思深刻分析东方社会的全部思想体系的证实——不仅迟发展国家两个方面压力在中国的直接结合导致了中国的革命罕见的持久漫长、艰苦卓绝，而且生产方式的变革、现代化追求的事业才刚刚拉开帷幕，更是困难迭出，障碍重重。今天，作为马克思主义整个体系中有机构成的关于东方社会的思想对我们尤为重要，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可给我们以重大的启迪：

一、必须着眼于生产方式的变革，以生产方式变革作为社会发展与变革实质性、根本性的内容。马克思从揭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停滞、落后出发评价东方社会，是其东方社会思想的基点与核心。生产方式由于其对于社会发展诸多因素的综合性、决定性，由于其对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的发散性、主导性，因而成为社会形态演进最基本的标志。在我国，社会主义不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准备好了社会化大生产和先进生产力的基础上建立的，而是摆脱外力控制和剥夺、击毁传统制度框架的选择。生产方式的变革并未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同步完成。第一，现代化大工业程度尚不足以改变农业大国“八亿农民种田”的基本国情。农村生产责任制的生命力唤醒我们回到真实的基点上来，但同时也表明我们尚不具备现代农业的条件。而只有当分散经营者产生联合经营的需求和自觉意识后，农业的机械化、科学化才

^① 毛泽东：《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55页。

会真正普及。第二，即使在工业及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条块分割、部门封锁、被动保守等体制弊端亦十分严重。“小而全”部门、“小社会”企业、“大院经济”等构成的格局带有浓厚的传统生产方式的色彩。第三，当改革遇到增长过热、供求失衡、物价不稳、秩序混乱等问题而将治理整顿提上日程时，实际是经济增长与经济环境发生了冲突。而经济环境问题的实质恰是落后生产方式作祟。因此，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必须以生产方式变革为尺度，无论是违背生产方式发展规律的虚假冒进的“一大二公”，还是脱离生产方式变革的急功近利、短期行为，都与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背道而驰。

二、必须从促进生产方式变革出发，重视商品经济建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由于产品地租形式必须同一定种类的产品和生产本身相联系，由于对这种形式来说农业经济家庭工业的结合是必不可少的，由于农民家庭不依赖于市场和它以外那部分社会的生产运动和历史运动，而形成几乎完全自给自足的生活，总之，由于一般自然经济的性质，所以，这种形式完全适合于为静止的社会状态提供基础，好象我们在亚洲看到的那样。”^①在马克思看来，东方社会作为静止社会状态基础的，是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结合。毛泽东亦指出：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②揭示经济形态与生产方式之间的不解之缘，是马克思主义一项极为精彩的基本原理，对指导我国今天的社会改革尤其至为可贵。作为唯一延伸下来的世界四大文明故乡之一的中国之所以被拉开距离，商品经济的弱化是一项带根本性的原因，而自然经济则成为传统生产方式的固化剂。既然如此，着眼于商品经济的催化作用，着眼于生产方式内在变革而发展商品经济就是社会改革的重要课题。须知，这和单纯着眼于市场作用和经济增长是有重要区别的。其实就商品经济本身而言，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经济与初级的简单商品经济和重商主义阶段的自发商品经济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起，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对商品经济进行具体的分析和选择。历史对我们是苛刻的：既不允许我们忽视、撇掉商品经济，又不允许我们消极地等待、依赖商品经济漫长的、自发的、代价沉重的作用过程。

三、必须从生产方式变革的需要出发调整所有制结构，调整生产资料占有、使用形式作用于生产方式的渠道。马克思之所以作出俄国农业公社可在一定条件下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假设，是看到了尚存的集体耕作制；之所以提出改造其相互隔绝的分散性，是看到其相联系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具体存在。其实马克思不仅在谈到东方社会时，而且一贯是从与生产方式相结合、相作用的角度考察所有制问题的。我们显然应当从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出发疏通关于所有制问题的认识途径。资本主义前期或初期私有制由于丧失在中国发展的条件及其种种弊端而为社会主义的选择所摒弃，是有充分道理的。但是**确立公有制本身不能代替生产方式变革的深沉、内在的要求**。所有制结构与形式应当是动态的，应当是适应生产方式变化要求、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要求不断变动的。这正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生产方式发展变化的规律所决定的。应当说，所有制关系问题在经济改革的深化中是难以回避的。所有制结构的不合理与僵化，使经济领域缺乏活力，技术更新频率低缓，生产效率低；经营方式单调僵死，反应迟钝，难以创新；实际所有者或使用者与法人占有者之间关系混淆，权力

①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897页。

②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86页。

和责任的关系模糊，利润、效率目标与社会目标之间关系不顺，社会的动力机制、筛选机制、调整机制等发生滞涩；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政府直接参与、高度集权和过分依赖计划的体制显得捉襟见肘，鞭长莫及；国际竞争压力和经济一体化趋势也在呼唤着政府职能和国营企业经营方式的转化……。在此情况下，关键在于要不要和怎样适应生产力发展与生产方式变革的需求，调整所有制结构、层次、形式和关系的问题。

四、必须坚持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变革的系统工程。马克思在分析东方社会时，不仅总是把生产方式与保守封闭的文化观念和专制主义政治结构相提并论，并且一再指出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共同造成东方社会停滞与落后的内在联系。既然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付不起漫长的时间和惨重的代价，既然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项主动自觉的行为和科学理性的选择，那就决定了改革发展必须仰仗一系列宏观战略的有机构成，必须保证政治、经济、文化变革的同步性、配套性、互动性。如果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尚有失误和教训，忽视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无疑是值得反思的题目；如果说亚洲“四小龙”创造了经济起飞先于政治改革的模式，则其小国国情以及对西方大国的微妙关系对我国来说断然不足为训；如果说苏联政治体制改革先行于经济变革而取得令人瞩目的初期效应，但其已见端倪的代价和深化发展的困境已足以发人深省；如果说日本以较快速度跻身于现代化先进行列的进程有可资借鉴之处，其“明治维新”的遗产、与传统文化中优秀成分相结合的现代经济文化与企业文化、科技教育的捷足先登等则不失为“它山之石”。文化变革是艰难的深层社会结构的变革。诚如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①因而，我们必须不失时机、持续深入地推进实在具体的政治体制改革，这已成为现代化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核心部位。

五、必须坚持开放与改革相辅相成，以自身的变革发展作为对外开放战略的支撑。发展中国家普遍有一种历史的遗憾，那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纷纷独立的历史转折并未使它们真正摆脱大国的经济控制和剥夺。新殖民主义借助价格体系、银行系统、跨国公司等，及其“援助”手段仍在不平等格局中谋求好处。主权独立并未使经济独立同时实现，这是一项十分发人深省的国际社会的现象。正是马克思指出东方社会被动挨打、沦为殖民地的原因，指出吸取资本主义肯定成就必须以东方社会自身变革为条件。获得独立与主权的国家必须以内在变革作为独立经济的支撑，方能在经济一体化国际社会改变不平等格局中的被动地位。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大国，不开放不行，盲目被动地置身于外来冲击也不行，只有开放是自身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健全、高效、有力的体制迎接国际竞争的挑战，方能在开放中获取生机。

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探索提出的问题越来越深邃繁杂，无论形势怎样千变万化，无论各种思考怎样众说纷纭，理论联系实际地、全面、准确地研究理解一下马克思东方社会思想，对于启迪和清理我们的思路，总归是十分有益的。

责任编辑：张宛丽

^①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95页。